

生活美学：阐释美好生活之道

刘悦笛



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人人几乎皆有此愿。无论时代变化，不管地域变迁，民众都把美好生活作为美好愿望，然而关键在于实现。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社会进一步发展，带来了民众达成美好生活宿愿的历史条件和文化契机。于是，一种与追求美好生活相匹配的“生活美学”便应运而生。美好生活与“生活美学”仅一字之差，而生活美学恰恰是提升美好生活的重要途径，也就是以“美生活”来提升“好生活”。

相关链接

哲学家眼中的“美好生活”



理想主义幸福观

代表人物：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等

亚里士多德认为，肉体享乐式的生活太动物属性，荣誉性政治式的“显得太肤浅”，只有合德性的沉思的生活才是最好的生活。康德的幸福观是将人作为追求幸福的主体与存在于彼岸的人类幸福二分，现实中只能追求，不能真正实现。黑格尔则把人类对幸福的追求看做是对绝对精神的向往，只有通过超人的精神力量才能自我实现。



现实主义幸福观

代表人物：伊壁鸠鲁、亚当·斯密、边沁等

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认为崇拜神和追求来世的幸福是浪费时间，而应该追求肉体的健康和灵魂的平静；亚当·斯密曾在《道德情操论》中追问人世间所有的辛苦和劳碌究竟是为了什么？“吸引我们的，是虚荣，而不是舒适或快乐。”边沁认为“为大多数人带来最大幸福”就是至善的，属于“趋乐避苦”的功利主义幸福观，他认为每个人能够在现实生活中感受到的幸福才是善的。

(文字：申唯正)

“生活美学”恰恰是美好生活的理想所在

在中国文化中，美好生活，其实是在言说两种生活：一个是好生活，另一个则是美生活。然而，我们往往以为，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的全部。所谓老婆孩子热炕头，有车有房，有点小爱好，有闲钱消遣，那就是好日子，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小日子。小日子不过是物质生活被满足的日子。在好生活之上的，其实就是“美”的生活。美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代表着我们在“好”以上的更高追求，这种追求就以美作为基本标准。

好生活，就是有“质量”的生活；美生活，就是有“品质”的生活。那么，两种生活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呢？好生活，一定要构成美生活的现实基础，而美生活则是好生活的理想升华。没有生活的理想，那就没有理想的生活，“生活美学”恰恰是美好生活的理想所在。

那么，我们民众选择过好生活，还是美生活？选择过有质量的生活，还是有品质的生活？有的人觉得质量就是生活的全部，有的人还会继续去求索生活的品质。吴冠中曾感叹国人“文盲”不多“美盲”多！我们要知道如何审美，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在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更因为审美是社会前进的推动性力量，同时也是衡量社会发展的高级尺度。

令人欣慰的是，“生活美学”在如今中国社会逐渐成了一个关键词，从茶道、花道、香道、汉服、家居、日常设计、公共艺术、社区设计到城市规划的各个领域，“生活美学”的践行者们都在倡导将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充分审美化。这恰恰是中国人对自身生活传统的一种复兴，而不是对于外来文化的拿来和借鉴。这股中国人的生活美学潮

流，正在悄然形成一种运动，它并不是“自上而下”的号令，而恰恰是“自下而上”地自然生长出来的，其国民心理基础，就在于“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中国的确需要整体的美学规划，既然曾是“礼仪之邦”，那将来也要成为“美善之国”，这才符合礼乐相济之华夏悠久传统。

这种生活传统就是“生活美学”的传统，应该说，“生活美学”的根就在中国。从孔子和老子建树起中国儒家生活美学与道家生活美学传统开始，在几千年中国人的文化审美化传统当中，“生活美学”就成了最主流的传统。这是由于，在中国人生活当中，审美与生活始终是处于一种不即不离的微妙关联当中，这种传统始终没有断裂过，一直延续至今。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美学就是“生活美学”，因为中国人的生活被古人赋予了审美化的追求，中国人的审美也在古代被奠定了生活化的根基。

三个层面：生理的、情感的、文化的

有趣的是，“生活美学”既是最古老的中国美学主流，也是最新颖的全球美学新潮。“生活美学热”不仅出现在东方，它已经成为新世纪以来全球范围内兴起的世界美学主潮。如此一来，中国美学传统与西方最前沿的美学理论，形成了异曲同工之妙，而且也形成了一种互动关联。“生活美学”对于西方美学而言也是一个最新的思潮，他们并没有这种将生活审美化的悠久传统，尽管他们的艺术传统非常久远。我们现在常说的“艺术”实际上是来自文艺复兴的西方概念，乃是西方现代性的产物，中国人接受艺术的概念不过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国古代有诗、画、舞、乐和建筑的分

殊传统，但是从来没有一个大的总体艺术概念将之统合起来。应该说，中国古人强调生活美化的传统，才是更为悠久的传统，各个艺的门类都被包孕在生活之内。

书法就是最显明的例证，书法在古代从来没被视为艺术的一个门类，而是与生活直接贯通起来的。近代开始，书画才成为艺术皇冠上的明珠，因为自西方引入艺术概念之后，东方人很自然地就把文人书法置于艺术的顶端（除了阿拉伯文之外外国乃是没有书法传统的）。然而，直到明代才出现“书家”这种身份，从王羲之、颜真卿到怀素的时代，都没有把书法视为纯粹的艺之门类，他们的作品也不是正襟危坐在那里进行创作，而就是包孕在日常生活实用化的信札、便贴、序言、手稿、祭文等等之中。我们发现，书法其实作为文人的日课，日常书写才是其根基，书法从古至今都没有脱离生活，道理很简单，书法之“书”不过就是写汉字，写出了一定的法度并变得美化才使得书成为“法”。

“生活美学”在中国，具有世界其他文明难以企及的广度与深度，它主要包括三个层面：第一就是“生理的”生活美学，这是关乎广义之“性”的，如饮食、饮茶等等，饮茶在东方传统当中不折不扣成了“生活的艺术”，所以才有“茶道”的艺术。第二乃是“情感的”生活美学，这是关乎广义之“情”的，交往之乐趣就属此类，如闲居、交游、雅集、人物品藻等等，这些在中国古典文化当中都被赋予了“审美化”的性质。第三则是“文化的”生活美学，这是关乎广义之“文”的。在文化当中，艺术就成为精髓，中国传统的诗、书、画、印、琴、曲是，但是文化在古典中国亦很重要，园林苗圃之美，博弈等游艺之美，游山玩水之美都是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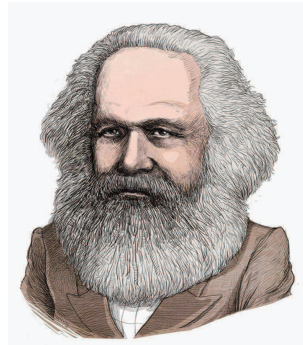
一种日用的美学，一种“体用不二”的美学

美学在中国，乃是与民众生活联系得最为紧密的哲学学科，它绝不能成为一种高头讲章，只作为抽象的理论而存在。“生活美学”之为“生活的”美学，就是要回归到现实的生活世界当中；从现实生活当中去升华美学问题，有了美学的反思之后再返回到生活现实当中。有了这样的循环往复，美学才能成为一种“活生生”的美学。“生活美学”作为一种日用的美学，乃是一种“体用不二”的美学。这个“体”，就是生活之体，就是中国民众的衣食住行用娱的生活本体；这个“用”就是将“生活美学”应用在其生活本体之内，这才是审美意义上的中国人的“知行合一”。

质言之，“生活美学”就是一种关乎“审美生活”之学，追问“美好生活”的幸福之道。美学在西方乃是哲学意义上的“感性学”，而生活化的美学在中国，则不只是西学的“感”学，而更是本土的“觉”学。中国化的美学，不仅与人类的感性世界直接关联，而且与中国人的“情理架构”紧密关联：中国人历来既强调不同于西方纯理性主义的“情本主义”，也强调情与理的圆融合一。“生活美学”乃是根源于中国本土既植根于生活又超逾于审美的悠久传统，这是一种生意盎然的“活的传统”，它可以为世界提供一种东方“生活美学”的最佳范本。

所以说，当今中国“生活美学”的积极践行者们，他们就是在发现中国人的生活之美，从而为中国生活立“心”——立“美之心”！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在今天的中国，“美好生活”成为一个影响日增的高频词汇，并成为国内学术界和理论界普遍关注的理论热点。对美好生活的核心之揭示，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课题，并本质地关涉到如何成就人民幸福、民族复兴的“中国梦”。那么，何谓美好生活？其核心和根本又何在？对此，不同的学科视野和理解路数有着不同的主张和观点。笔者觉得，关于美好生活的深入解答，还是要回到马克思那里。

锐见

断言消费驱动目前为时尚早

李凌

“消费驱动”并不是说消费得越多经济增长就越快，消费也不像投资那样具有乘数效应，而是指消费对再生产具有牵引作用，消费需求改变引发生产内容改变，消费结构升级引导产业结构升级。

近来，关于“消费驱动”的判断不绝于耳，主要依据是2018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增加到了76.2%，达到2008年以来最高水平。在笔者看来，上述研判包含着对加快调整经济发展方式的善意，但却陷入了投资与消费“非此即彼”的错误逻辑，不利于真正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

关于“消费驱动”的提法可能与迈克尔·波特有关。波特把经济发展划分为“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财富驱动”相互继起的四个阶段，不过他并未提出过“消费驱动”。2008年的那次全球金融危机，促使人们在对中美两国消费率和投资率的对比中，反思“高投资、高出口、高储蓄、低消费”增长模式带来的问题与弊端。认识到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大国，如果不能充分开启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而是过多地依赖于投资和出口，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将受到质疑。于是，源于波特提到的“投资驱动”，结合扩大消费需求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重要性，便有了“消费驱动”一说，“消费驱动”成为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成功彼岸。

“消费驱动”的论断有其合理成分。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循环往复的内在规律性看，如果消费环节不畅、消费需求不举，就会造成大量生产物资滞销、企业资金难以回笼、经济生产活力不足等问题，从而梗阻社会再生产过程。因此，“消费驱动”并不是说消费得越多经济增长就越快，消费也不像投资那样具有乘数效应，而是指消费对再生产具有牵引作用，消费需求改变引发生产内容改变，消费结构升级引导产业结构升级。在这个意义上，“消费驱动”是一个迂回过程，与“投资驱动”发生的机理有所不同，两者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从“消费驱动”的国际经验来看，大致需要满足三个条件。

一是较低的恩格尔系数，大约是在10%左右。恩格尔系数代表食品支出在个人总支出中的比重，美国、英国的恩格尔系数大概都在10%左右，而根据国家发改委编写的《2017年中国居民消费发展报告》相关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刚刚进入30%，中国正在从小康迈向富裕的大路上阔步向前，但与“消费驱动”的发展阶段还相去甚远。

二是物产极大丰富，人均消费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如果简单地用中美人均消费数据做比较，就能看到，2018年底美国是约20万亿美元产出和80%-85%的消费率，中国是约13万亿美元产出和55%-60%的消费率，美国的消费总额大概是中国的2倍，而中国人口大约是美国的4倍，这意味着中国的人均消费支出水平只有美国的1/8。如果考虑物价，差距可能更大，因此中国离“消费驱动”可能还有相当长的距离。

三是健全的消费体制机制，缓解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当前，受诸多因素制约，城乡居民“不愿消费、不敢消费、不能消费”的现象仍旧比较普遍。从2018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实施方案(2018-2020年)》来看，健全消费体制机制，既需要在供给端进一步放宽服务消费领域市场准入，健全基于消费者个性化反馈信息的分散决策机制，加快推进重点领域产品和服务标准建设；又应当在需求侧完善促进消费结构升级的住房政策体系和社会保障政策体系，优化促进居民消费的财税政策、金融政策、收入分配政策和公共服务政策，加强消费信用建设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等。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副主任)

美好生活的核心是劳动的幸福

陈学明

自1932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公开发表以来，西方出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解释路向。马尔库塞的《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和弗洛姆的《马克思的人的概念》可谓是代表作。他们强调，人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和焦点，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对人的本性的研究，并由此出发才研究社会。也就是说，他们是从人的本性出发来判断一个社会是好是坏，来判定一个人的生活是幸福还是痛苦。

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流派给予我们最大的启示是必须基于人的本性来研究人的生活。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人的本性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即劳动。尽管这一思想贯穿于马克思的一生，但最典型最系统的表述还是体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不仅明确地认定人的本性是劳动，认为劳动作为一种自由自觉的生产生活和能动的类生活，是人确证自己是类存在物的根本方式；而且围绕劳动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在《资本论》

中，马克思进一步对劳动做了具体规定和论述：劳动是人的自我实现，是他的体力和智力的表现；在劳动这一真正的活动过程中，人使自己得到了发展，便成为人自身；劳动不仅是达到目的即产品的手段，而且是目的本身，是人的本质能力的一种有意义的表现，因而劳动是享受。

把人的劳动视为人的本性，应当说不是马克思所特有的思想，不少思想家也有类似的观点。譬如，马尔库塞在《理性与革命》中特别推崇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就是因为在他看来黑格尔在其中表述了“关于事物所固有的潜力的观念。关于潜力在其中显现自己的辩证的过程观念，以及关于这个过程就是这些潜力的能动运动的过程”。再如，歌德也用诗的语言表达了人的本性是劳动的思想。他在《浮士德》中借用浮士德的口吻教诲人们：“既不是财产和权力，也不是感性的满足，能实现人对人生的意义的期望；在这一切中，人依然跟整体相分离，

因此人仍然是不幸的。只有在生产性的活动中，人才能使人生有意义。”又如，弗洛姆在《寻找自我》中，探究“我”究竟是什么？他最后找到自我就是劳动，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存在还是占有》一书。

既然人的本性在于劳动，那么人只有在劳动中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潜能和本性，从而也只有在劳动中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事实上，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劳动是人及其社会的存在本体，是人之为人的基础存在规定。劳动不仅创造了人，而且还不断地形塑人、成就人、提升人，从而劳动构成人基本的存在方式和存在内容。离开了劳动的视阈，我们就难以科学地把握人的本质和真理，也难以正确地揭示人的幸福基础和美好生活的核心。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劳动是人的存在之本质，劳动是生活的根基，劳动是成就美好生活的基石，劳动是奠基幸福生活的要途。

(作者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